

亲历中国丛书

主编：耿昇 李国庆

清末

驻京英使信札

(1865-1866)

(英) 密福特 著

温时幸 陆 瑾 译

李国庆 校订

The Attache at Peking

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

清末 驻京英使信札 (1865-1866)

(英) 密福特 著

温时幸 陆 瑾 译

李国庆 校订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末驻京英使信札(1865—1866)/(英)密福特著;温时幸,陆瑾译;
李国庆校订.—北京: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0.5

ISBN 978-7-5013-4368-3

I.清… II.①密…②温…③陆…④李… III.中国—近代史—史料—1865~1866 IV.K252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9667 号

书名 清末驻京英使信札(1865—1866)

著者 (英)密福特 著

温时幸 陆瑾 译 李国庆 校订

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)
(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)

发行 010-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

66174391(传真),66126156(门市部)

E-mail btsfxb@nlc.gov.cn(邮购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→投稿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(毫米) 1/32

印张 9.75

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13-4368-3

定价 29.00 元

序

2002 年跟郭又陵社长、周玉玲编辑商定编辑出版《亲历中国》丛书,并得到耿昇先生的支持,于 2004 年出版第一批 3 种,倏忽已 5 年过去了。

本丛书的宗旨,耿昇先生 2004 年写的序中是这样说的:“《亲历中国》丛书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,包括探险记、笔记、考察报告、出使报告、书简等。内容力求客观、公允、真实,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。在允许的范围内,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,填补空白和弥补不足之处。”也就是说,集中精力从一个方面配合国内方兴未艾的对西方汉学(中国学)的研究。

自改革开放后,中国爆发了又一次“西学东渐”的热潮,域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经典作品被有系统、成体系地引进,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“国外中国学研究室”的《国外研究中国丛书》,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吉林教育出版社的“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”和“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”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“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”,江苏人民出版

社的“海外中国研究丛书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“海外汉学丛书”，中华书局的“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”、“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”，以及“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”，商务印书馆的“海外汉学研究丛书”，辽宁教育出版社的“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”，新疆人民出版社的“瑞典东方学译丛”和“西域探险考察大系”等，对中国思想解放、学术研究等诸多方面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但在游记方面尚欠力度，成系列的只有时事出版社的“‘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’丛书”，光明日报出版社的“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’名著译丛”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“‘认识中国系列’丛书”。零散的同类著作有三联书店 1988 年出版的《中国记行》，海南出版社等出版的《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——十六世纪手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出版的《大中国志》，以及商务和三联分别出版过的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等。

我们觉得，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，离不开旅行家、探险家以及后来的外交、商务人士和学者。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，包括探险记、笔记、考察报告、出使报告、书简等，虽然不是海外汉学的主流，也应该视为与汉学和中国学紧密相关的领域，不容忽视。

张西平先生把西方汉学大致分为“游记汉学”、“传教士汉学”、“专业汉学”三个时期。这是从时间上说的。如果从内容着眼，只有传教士汉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，即便到了专业汉学时期，游记汉学还是存在的。诚然，早期的游

记汉学之基本特点是作品停留在对中国表面的报导上,多半热衷于异乡奇闻趣事的报导而缺乏哲学的思考,尚不能深入中国文化的内核之中,而耶稣会士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由于在中国生活时间较长,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较深,因而“传教士汉学”较之“游记汉学”更为可靠、更为准确。但是它们都带给西方中国信息、中国知识,为西方哲人研究中国、思考中国提供了直接丰富的思想素材,又引发了持续将近一百年的欧洲“中国热”,使中国文化在大众生活中成为一种时尚。而中国门户开放之后此类文字的作者,无论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传教士、外交官,或是为清廷所雇佣的外国官员、教习和科技人员,或是西方报刊派驻中国以及在华西文报刊的记者,还是考察、游历中国的作家、学者、探险家、画家和到中国经商的商人等,他们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与早期游记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尤为可贵的是,他们往往亲历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,所记可补正史之不足;又因此类著作一般笔调轻松,更有些趣闻轶事,受到广大读者的喜好,所以既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,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

按照这一宗旨,我们第一批出了英国阿奇博尔德·立德夫人的《我的北京花园》,此书生动地反映了庚子事变后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社会状况;俄国叶·科瓦列夫斯基的《窥视紫禁城》,反映的是道光末年蒙古和北京的面貌;哥伦比亚唐可·阿尔梅洛的《穿过鸦片的硝烟》,是作者于第二次

鸦片战争期间在中国的见闻。第二批出了两位画家的游记：英国托马斯·霍奇森·利德尔的《帝国丽影》和美国阿瑟·哈罗德·希思的《画里中国》，图文并茂地再现了清末中国首都的通商口岸城市的形象；还有英国卜力爵士在 19、20 世纪之交任香港总督时的中国见闻和思考。

在过去的 5 年里，“允许的范围”已逐渐扩大，西方汉学研究在我国已蔚为大观。最近推出的汉学与中国学丛书包括：上海远东出版社的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；三联书店的余英时作品系列；河南大象出版社的“国际汉学研究书系”（包括“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”、“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——中西文化交流研究”、“当代海外汉学名著译丛——儒学研究系列”三大系列）；上海古籍出版社的“上海史研究译丛”等。就是在游记这方面也大有改观。上海书店出版的“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”丛书，包括了英人普特南·威尔的《庚子使馆被围记》，德人瓦德西的《瓦德西拳乱笔记》，美人霍塞的《出卖上海滩》；“走近中国”文化译丛包括了奥古斯特·博尔热的《奥古斯特·博尔热的广州散记》，亨利·柯蒂埃的《18 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》，维克多·谢阁兰的《谢阁兰中国书简》，皮埃尔·绿蒂的《在北京最后的日子》，约翰·曼德维尔的《曼德维尔游记》，托马-西蒙·格莱特的《达官冯皇的奇遇——中国故事集》，奥古斯特·博尔热的《中国和中国人》，奥登和衣修伍德的《战地行》，亚历山塔丽雅-大卫妮尔的《巴黎女子拉萨漫记》等

共十部。南京出版社“西方人看中国”文化游记丛书包括两卷本法国古伯察的《中华帝国纪行》、英国弗雷德·亨利·巴尔福的《远东漫游》、美国萨拉·康格的《中国来信》和英国彼得·弗莱明的《独行中国》。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的“瑞典东方学译丛”和“西域探险考察大系”，包括斯文·赫定的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》、《丝绸之路》、《罗布泊探秘》和《游移的湖》，沃尔克·贝格罗的《新疆考古记》，橘瑞超的《橘瑞超西行记》，凯瑟琳·马嘎特尼的《外交官夫人的回忆》等。而中华书局以新名字“西方的中国形象”译丛，重出了此前时事出版社的“‘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’丛书”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的“‘西方人眼中的中国’名著译丛”，共包括何天爵的《真正的中国佬》，罗斯的《变化中的中国人》，雷蒙·道森的《中国变色龙——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》，马森的《西方的中国及中人观念 1840—1876》，明恩溥的《中国人的气质》和《中国乡村生活》，麦高温的《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》，哈罗德·伊罗生的《美国的中国形象》，立德夫人的《穿蓝色长袍的国度》等。北大还有比较文学博士生选了“17、18 世纪英国来华游记中的中国形象”作为其论文题目。

在这种繁荣的局面里，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。比如选题重复问题。马嘎尔尼所著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，现已有中华书局 1916 年刘半农译本、1973 年香港秦仲和改名为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的重译本、珠海出版社 1995 年李广

生整理本、巴蜀书社 2000 年重版本、2006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改名为《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》的林延清解读本等 5 个版本。而明恩溥的《中国人的气质》也有不下 5 个译本(光明日报出版社,匡雁鹏译《中国人的特性》;学林出版社,秦悦译《中国人的素质》;学苑出版社 1998 年、三联书店(香港)2000 年,乐爱国、张华玉译《中国人的性格》;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5 年、新世界出版社 2005 年,张梦阳、王丽娟译《中国人气质》、《中国人德性》;京华出版社,林欣译《中国人的素质》)。这无疑是翻译和出版资源的极大浪费。西方的中国游记浩如烟海,无论哪个个人或哪个出版社,都不可能一揽无遗,每个译丛编选者都只能取一瓢饮。必要的互通信息甚至适当的分工协作恐怕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。又如翻译质量的良莠不齐,虽是当前翻译出版界的常态,也不得不反复指出。百年前旧译原封不动的重印是否必要和合宜,也可以商讨。比如 1916 年刘半农译的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,陈诒先、陈冷汰 1913 年译的《庚子使馆被围记》和王光祈 1928 年译的《瓦德西拳乱笔记》,文笔虽然雅致,但如今的读者又有多少能欣赏文言呢?

在这样的形势下,我们还是坚持原来的宗旨,继续我们的努力,力求选题新、译文好。

这次新出的有三种。

《北京与北京人(1861)》是英国医生芮尼的日记。1860 年英法联军入京,火烧圆明园,并逼迫清廷签订条约,

除赔款、开放通商口岸等等之外，还要求在京设立使馆。本书便是作者跟随英法使团连同军队一千人等从天津前往北京，在北京设立使馆后第一年内，作者认为值得记述的事件和对事物的观察。这是中外交流史上第一次有外国使团常驻北京，对于这些外国人，北京人怎样看他们？而他们又怎样看中国人？作者透过对事件的叙述，展示他们的观点，读来颇饶趣味。另外，就在这一年里，中国政局发生了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——祺祥政变，亦称辛酉政变，造就了慈禧垂帘听政，专权中国 40 年。在书中，政变前的蛛丝马迹，读来也耐人寻味。

英国施美夫的《五口通商城市游记》，按作者的说法：“并非仅仅是一部传教记事。本人游历新近开放的中国城市之主要目的乃是勘察地形，为英国教会其他传教士们铺平道路。为此，本人收集统计资料，记录综合性观察，提供详尽数据，以便对该国社会、政治及伦理道德各个方面作一正确评估。因此，读者在本书中会看到，许多题材的处理与信息的提供，与严格意义上的传教活动记事有所不同。作者以为，无论事物看上去与传教活动有无多大关联，只要有助于透视华人风俗与特性，皆非无足轻重或不合时宜，均应素心选录，以期拓展救世主之王国。”也就是说虽然目的是为了传教，此书客观上记录下了五口通商城市暨香港、舟山当年的实际面貌。

最后一种是约翰·巴罗爵士的《我看乾隆盛世》。在中

西交流史上,两百多年前的英使马嘎尔尼勋爵访华(1792—1794)无疑是一重大事件,对中国此后命运的影响既深且远,历来为国际学界所关注。关于这一事件,西人记录甚多,有差不多 15 位参与此行的人留下了他们的见证,其中 5 种已出版,译成中文的也已有三种:正使马嘎尔尼所著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,副使斯当东所著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和安德逊著《英使访华录》。然而马嘎尔尼勋爵的《乾隆英使觐见记》所有中译都未注明出处,但显然不是他的全部记录。其中国之行的日记及观察要迟到 1962 年才被全文整理出版。斯当东爵士的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是此次外交使命的“正式报告”,详于出使中国的整个活动过程,兼及一些具体见闻,然而出于当时现实的考虑,其报告中有隐瞒、美化和歪曲事实的地方。安德逊的《英使访华录》出版最早,然而是由英国书商请人据其日记整理的,目的在于满足当时英国人迫切了解第一个使团访华情况的愿望。一般认为此人在使团里的地位低下(有的说他是管理船只的士官,有的说他是大使的跟班),不可能知道出使活动的核心内容;学识也贫乏,所记多有错误。巴罗是使团运送礼品的总管,回国后做斯当东的图书管理员,帮助斯当东写作了那份正式的访华报告,后来又做了马嘎尔尼的私人秘书。因此,在有关首次访华使团的问题上,他比一般人掌握了更多的资料,特别是当时尚未披露的马嘎尔尼有关出使中国的所有记录。他也可能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。他的书在使团

回国后十年才出。跟其他著述不同的是,巴罗对已见于他书的来华使团在华的行程之类只作略述,更多着眼于整个旅途中的所见所闻,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比较和思考。全书共十章六百多页,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、财政税收、农业外贸、科学技术、民情风俗、妇女家庭、宗教信仰、绘画建筑、语言文学、天文医学等方面,简直可称“中国百科全书”。因此,此书一出就大受欢迎,很快被译成德文、法文出版,并被经常引用,成为当时欧洲人有关中国的重要参考书之一。他的思考当中不乏中肯精到的见解,也免不了误会和偏颇。但总而言之,此书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之行的深远影响、了解当年西人眼中的中国,提供了一个不同凡响的文本。

接下来我们要推出的有英国夏金的《玄华夏》和美国柏生士的《一个美国工程师在中国》。前者 1887 年来华,先任《字林西报》编辑,后进入中国海关工作,后者 1898 年受合兴公司之命,以总工程师资格率铁路工程人员来华,测量从汉口到广州的地形,为建粤汉铁路做准备。他们都见证了清朝末年中国试图改良自强的一段历程。英国密福特的《清末驻京英使信札》。作者 1865—1866 年任驻华大使馆二等参赞。此书即他当时的书信集。此书可当芮尼日记的续集来读。英国著名战地记者林奇的《文明的交锋:一个“洋鬼子”随联军行记》,从踏上中国上海写起,直到事件结束,详记所见所闻,竭力保持“不偏不倚”的立场,对联军和列强的作

为和政策有所批评,是庚子事变的一个难能可贵的西人见证。

我们还要再次强调,整理、翻译、出版这一系列丛书的目的,是为了保留历史资料,因而一般不作删节,也不在文中横加评论。但是,这些书的原作者来自那样的时代,身份各异,立场多样,有些人免不了带有种族优越、文化优越和宗教优越的心态,行文当中就表现出对中国、中国人、其他宗教、其他文化等的歧视。也许还有个别人是怀着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、思想控制、殖民控制等目的来到中国的。希望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,既有海纳百川的胸怀,也有清醒的认识;既要尊重他人的善意旁观,也要站稳自己的立场;对一些恶意的观点,能坚持批判的态度。

最后要感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郭又陵社长和其他领导,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,这种选题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潮流下是不易长期坚持的。也要感谢周玉玲编辑在幕后所做的大量工作,使得丛书能按部就班地出版。还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得到读者的认同。

李国庆

2007年元月于哥伦布市

序

外国人来华，大致始于两汉，继之于唐，盛之于元，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，到晚清时期才形成一股巨大潮流。国外发展至今的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——海外汉学，其发祥时代的第一阶段，便是“游记汉学”，亦可称之为“记实汉学”（游记、航海记、出使报告、经商报告、日记、札记、书简、考古报告）；其后发展为“宏观汉学”，即译注中文基本经典和全面笼统地介绍中国；最后才发展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，将汉学纳入到了全人类整体的学术研究范畴中。中国人很早就曾出西域、东渡日本或下南洋。外国人也不断来华，与中国社会各界接触。这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之肇始，同时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交往之源缘。不过，两汉时期的外国人入华，主要还是为了朝拜天朝上国、入贡和从事贸易等，尚谈不到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探讨。

外国人的来华游记，除了日本遣唐使的历次报告之

外，就是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们了。如柏朗嘉宾（Jean de Plan Carpin, 1182-1252年），他于1245-1247年出使蒙古并参加贵由汗的登极大典，回国后向教廷提交了《蒙古史》的出使报告。他的使命是游说蒙古人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结盟以联合对抗撒拉逊人，同时也充当了刺探蒙古人实力的“间谍”角色。他的外交使命彻底失败了，却提供了西方有关亚洲人类学、宗教学和史地学的第一部真正的科学论著。继此之后，又有鲁布鲁克（Guillaume de Roubrouck, 1215-1270年）于1253-1255年出使蒙古，鄂多立克（Odoric de Pordenone, 1286-1331年）于1318-1328年出使中国，马可·波罗于1271-1295年出使中国，孟德高维诺（Jean de Mont-Corvin, 1247-1328年）于1289-1328年任北京大主教等。其中最有影响者，非马可·波罗及其传世名著《寰宇记》（1298年）莫属。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：“马可·波罗活着的时候发现了中国，死后发现了美洲。”因为哥伦布正是由于在阅读马可·波罗著作时受到启发，为寻找“契丹”和“日本国”，才发现了美洲大陆。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，必须受中国政府的严格节制。这既是朝贡体制的产物，又具有外交特色，企图与中国结盟而反对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的潜在对手。南洋与中亚的来华人员，大都是为在朝贡名义的掩饰下经商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来华人士当属后者。

外国人大量来华并留下记述者，还是等到明末才开始。这基本与西方史学界所说的“地理大发现”是同时代的，也就是自16世纪之后。这期间的西方来华人士的代表是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，1552-1610年）。他自1582年入华，直到1610年逝世于中国。他留下的那部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，是由金尼阁整理翻译后才出版的（1615年）。在这个时代，来华的外国人不仅数量大增，而且身份也复杂起来了，身负形形色色的使命。有外交官、传教士、旅行家、探险家、商人等，甚至还有海盗和难民。他们所属的地区，已经不仅限于亚洲和欧洲了，而且还涉及到了非洲和美洲。中国已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履。此时来华的外国人，除了为“朝贡”贸易之外，已经出现了殖民主义者蠢蠢欲动的倾向了。但中国的主权还是完整的，外国来华人士无法将他们那一整套目的强加于中国。中国依然为“天朝上国”，既想派人出洋巡视天下，也希望天下诸邦来朝。

到了清朝后期，特别是继鸦片战争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，中国国门洞开，外国来华人员更多，甚至还形成了外国的“租借地”和“割让地”一类的“国中之国”。中国的边关就如同不设防一般，任人出入。这一方面与西方殖民列强的崛起，疯狂地掠夺和瓜分海外殖民地、西方资本主义也在贪婪地争夺海外市场有关，同时也是中国清政府的国运日衰、腐败无能造成的灾难性局

面。在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中，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与殖民主义的活动相联系。最新奇的是，在大批外国来华人士之中，除了那些传统职业者之外，又多了一批学者式人物：考古学家、史地学家、人类学家、矿业学家、气象学家、动植物学家、建筑师、教育家、艺术家。这个时代的中国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。弱国无外交。清政府不但不能有效地节制这些外国人，甚至还要受制于他们。这与明末和清朝前期的形势相比，已经大相径庭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这些来华的外国人士回国后，或者就在中国（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），大都要写成许多著作：出使报告、信件、游记、考察记、考古报告。他们的这些著作，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，至今已成了难得的历史资料，成了当时中国的写真。

他们中的许多人，特别是那些学问深奥而又在中国逗留时间较长的人，广泛地与中国各界人士交往，甚至与中国各级官府关系甚笃，直至进入皇宫为朝廷和皇帝本人效力。他们观察问题比较仔细，在各种考察中又动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段。他们特别注意搜集口碑传说。他们记录下的许多内容，是中国官修史不屑于记载或不敢记载的（如宫廷斗争等）。这些论述，完全可以补中国史书之阙，起到补史和证史的作用。

在清代，这些来华的外国人，除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因